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罗 波◎ 著



芄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系列二)

何国强 主编

新龙「夹坝」的历史与文化解读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罗 波◎著



新龙『夹坝』的历史与文化解读

开野东南的民族丛书（系列二）

何国强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龙“夹坝”的历史与文化解读/罗波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 12

(芄野东南的民族丛书/何国强主编. 系列二)

ISBN 978 - 7 - 306 - 05894 - 2

I. ①新… II. ①罗… III. ①藏族—民族文化—研究—新龙县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7418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嵇春霞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李艳清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6.25 印张 277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苟怀四方志，偏向边地行

（代序）

何国强

文化人类学在西方主要是研究海外民族的。中国引入这门学科时，学者们也是到民族地区做调查，了解异域的文化。例如，1929年调查广西凌云的瑶族，1930年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到了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推行社区研究方法，派遣师生到内地和沿海做调查，开辟了该文化的实证研究方向。从此，中国民族学有了两种教学研究倾向或南北学派的划分。

虽然南派醉心于民族地区的简单社会，北派专注于汉族地区的复杂社会，但从整个学科来看，这种“自然分工”是可以接受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北两派不复存在，中国民族学回到南派的研究旨趣——只调查少数民族，不调查汉族，但理论指导已经有所不同。改革开放改善了这一局面，继1987年召开汉民族研讨会，更多的人开始到汉族农村做调查。回顾中国民族学走过的路程，学科的目标始终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以田野调查方法为主，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时兼顾汉族的文化。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华民族乃一个整体，由几十个少数民族和汉族长期融合而成。各民族间，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联系很密切。汉族人口众多，主要集中于内地和沿海；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主要分布于西部省份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到了光荣的责任，而且少数民族的民族数量多、文化类型多、占有资源多，所以民族学的首要研究目标是少数民族。但是，这种研究不能采用“单轨”的方式，因为如果只研究少数民族而不研究汉族，许多问题就弄不清楚；反之，亦然。另外，即使两者都研究，也不能平列对待。外国人类学家到中国来做实证研究，与我们面对的情况不同，无论调查汉族还是研究少数民族，在他们看来都是异文化。

研究民族主要是研究民族的文化属性，而不是研究其体质或其他自然属性。文化总是流行于确定的地域，受空间框架的限制；并且在历史长河中沿袭，受时间框架的限制。在时空条件的制约下，文化通过群体行为的传递和民族心理的投射有了固定的模式，因此，研究文化就是要寻找作为其底蕴的模式

及其成因。为了揭示文化性质与时空因素的关联，有必要采用“区域文化”的概念来反映实际情况。例如，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区域文化（藏文化、纳西文化等），汉族也有自己的区域文化（客家文化、福佬文化、广府文化等）。

国内区域文化的研究与黄淑娉的名字分不开。黄先生在50年的田野调查经历中，“前四十年研究异文化，后十年研究本文化”^①，研究重点可想而知。她说：“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使我深感汉族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当我从研究异文化转到研究本文化时，发觉先前对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为我的汉民族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人类学理论有进一步的体会。”^②这就拓展了杨成志“在中国搞人类学，非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就很难成功”^③的观点。笔者不惑之年受业于黄先生，继而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从教，受南北两派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滋生了研究两种区域文化的志趣。这种志趣推动着自己在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做调查，也调查广东省的汉族文化。笔者通过指导研究生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达到了为中国民族学培养人才、传承研究志趣的目的。

区域文化研究是探讨民族文化的源流关系、空间分布、内在结构、外在条件、功能特性和类型归属，从而揭示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一门学问。根据研究范围的大小，可将其分为三类，即宏观研究以全球民族文化为对象、中观研究以一国或一大地区的民族文化为对象、微观研究以局部地区的民族文化为对象。《芄野东南的民族丛书》是中观研究的成果，其中每本书所涉及的某一局部地区的一个主题则属于微观研究的成果；根据层级节制的原则，研究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民族属于宏观的区域文化研究之组成部分，其中每本书则属于中观的区域文化研究之一部分。

从技术上看，研究区域文化要讲规则。首先，一种民族文化是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应对方式的交响，所以，在相似环境中的民族可能有同类型的文化，也可能没有；置身于不同环境的民族的文化类型可能不同，也可能相同。此处并不想引申这个原理，只想强调有些因素可以在书斋里慢慢品味，但民族文化非亲临其境不能完全了解，因此要坚持田野调查。

其次，区域文化是会成长、移动和变迁的，许多特质是通过民族迁徙、商贸往来、族际通婚甚至战争或征服等事件来传播的，又通过当地人的采借或抵御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民族交融的结果。文化的变动性决定了区域文化研究必须

① 周大鸣、何国强主编：《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② 黄淑娉：《从异文化到本文化——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回忆》，见周大鸣、何国强主编《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页。

③ 杨成志：《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见《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49页。

持以动态的观点，既要注重空间的变化，也要注意时间的变化。动态观点要求把当前的文化现象作为历史的结果和未来发展的起点，要求研究不同发展时期和不同历史阶段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这不仅是区域文化研究本身的需要，而且也是这门学问在国家建设、区域开发中发挥作用的需要。

最后，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从静态来看，大致有三种方法：①野外调查（或称“田野工作”）；②室内分析、综述和模拟相结合；③用正确的预设来统率材料。三者当中，田野工作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大部分数据和第一手资料来自于它。从动态来看，大体有三个步骤：①形成预设，指导调查并接受实证材料检验；②参与观察、收集材料、增加感受、检验或修正预设；③撰写民族志。三者是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过程。

以动态的观点来解释静态的社会结构需考虑文化的层次性。也就是说，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的文化是互相作用的，周而复始就形成了惯性。传统就是一种带有惯性的文化，不论它最初是怎么形成的，原动力来自何方，一旦形成传统，其自身就成为影响历史的独立因素。传统文化有保守的功能，也有进步的功能。后者主要是对社会起稳定作用，以舒缓现代化带来的张力。因此，区域文化研究应关注四点：①族源与族体，如收集各种关于起源的传说、记录民族迁徙的故事、进行活体测量等；②物产、资源与当地人对其利用，了解其生产特点、经济结构与生活习俗；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通与信息条件的改善以及地区间、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增强，民族融合与同化程度加深；④国家的民族政策内容和实施效果，行政区划和管理权限的变动与保持民族文化完整性的关系，当地民族的评判标准与评价内容。关注文化的层次性有助于国家制定科学的民族政策，更好地开发当地资源，促进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的统一；同时，有助于相关学科的建设，推动民族教育、民族地理、民族史等研究的发展。

研究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区域文化，需注意地理、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互相纠缠。这片区域覆盖中国西南部、缅甸北部和印度东北部，生活着十几个民族。其中，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有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彝族、傈僳族、景颇族、白族、普米族、独龙族、怒族、傣族等民族，各个民族均由部落构成。这些民族的语言均属于汉藏语系，但有缅藏语族和壮侗语族之分。前者又有藏语支、景颇语支、彝语支和未定语支之分，后者则仅有壮傣语支。这片区域也是中、印、缅三国毗连的地方，边境上有些地段没有正式划界，和平时期边境民族可以自由往来。由于各种原因，当地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各国的行政管理都有鞭长莫及之虞。目前，《艸野东南的民族丛书》的作者仅在中国境内的川、滇、藏三省（自治区）交界地带做调研，考察民族分布、人口规模、聚落构成、生计模式、生活方式、风俗制度和社区控制等内容，了解

当地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的联系。印度、缅甸和英、美等国学者在中国对面边境一方做调研。中外民族学工作者共同研究青藏高原东南部，符合“礼失求诸野”的含义：文明边缘地区的文化演进迟缓于中心地区，更容易保存古朴形态的文化。假如今天要去寻访原生的文化形态，最合适调查的地点不在内地，而在边陲。2013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彼得·伯杰教授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弗兰克·海德曼教授合编了一本教科书《现代印度人类学：民族志、主题和理论》^①，勾画了印度共和国成立至今60年的人类学历程。全书共19章，每章描述一个邦的民族文化。其中，第12章专门讲述青藏高原东南部印度一侧的情况，题目是“东北印度：民族志和政治特性”。

2013年年底，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芄野东南的民族丛书》（系列一）。2015年，系列一获得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2016年年底，《芄野东南的民族丛书》（系列二）即将出版。两套丛书均为中山大学出版社组织申报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与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成果^②，系列一由7本专著组成，系列二由4本专著组成，作为后续成果。科学的区域文化研究成果是长期调查、严格择材、反复构思、贯注理论和精心写作的产物，这11本专著就是这么循序渐进、一步步锤炼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系列二的4本专著后来居上，因为4位作者承担过系列一的工作，在后续研究中显得更有经验、更加成熟，体现了青藏高原东南部民族研究的推陈出新。

以下对系列二4本专著的精要概述一二：

《动力与桎梏：澜沧江峡谷的盐与税》描述了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的盐业生计模式。全书贯穿了纵横两面法：纵向从吐蕃时期到清末民初，描述了盐业生产、交换市场和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横向则着力于社会结构的分析，通过把盐看作民族交往和交融的链环，以盐税作为主线，围绕晒盐技术、人口和制度这三大要素的内在关系层层剥离，带出与盐产品相关的诸多因素，特别揭示了澜沧江峡谷的盐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通过分析传统的交换关系，了解各种地方势力（土司、喇嘛寺和头人等）为争取利益而发动的博弈，围绕盐的生产、流通和交换而展开的权力之争来探讨当地社会变迁的动因。

《内生与外依：迪麻洛峡谷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研究》依据取自滇西北高山峡谷的一个民族村落的第一手资料，描述了当地逐步扩大与外界交往的过

^① Peter Berger, Frank Heidemann. *The Modern Anthropology of India: Ethnography, Themes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13.

^② 《芄野东南的民族丛书》（系列一）于2011年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芄野东南的民族丛书》（系列二）于2015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6年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程，反思了现代世界体系在理论和现实社会中的双重局限，即当地社会在迎合世界体系的同时也产生着拒斥。主要表现为三点：①生活自给品的大量存在；②传统生计地位的稳固；③现实能力的制约。其中，第一点是文化适应和习惯延续的结果，第二点是相对于市场的风险而言的，第三点是因为获取收入的途径有限。作者指出了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派”的局限，回答了偏僻山区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具体方式、动力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当地民众的生活及命运发生的变化等问题。

《新龙“夹坝”的历史与文化解读》展示了自清以来尤其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原怀柔县、瞻化县）流行的一种称为“夹坝”的民风，严重时此起彼伏，屡禁不止，导致人心惶惶。作者以新龙藏族群众的抢劫民风为切入点，以历史文献材料为基础，选择历史上发生频率较高的区域做田野工作，通过走向历史现场的方式勾画此民风流变的过程，钩沉该社区及其周边社会的民风与习惯、政权与法律的关系；通过深入分析，探究藏族群众抢劫民风的具体维持机制以及历代政权的辖治方式，进而探讨新龙藏族群众抢劫频发的三个方面的维持机制以及历代政权打破这些维持机制的过程与方式，达到对此现象进行深层次历史与文化解读的目的，为理解地方独特的文化提供一种新的模式。

《三江并流核心区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持机制研究》根据三江并流峡谷区的选点调查，再现了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世外桃源：虽然这里有多种民族聚居、多样宗教共存，但人们并没有因为身份特征的差异而产生交往困境；相反，他们却能够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平和共处、相互包容，共同建构并维持了一个和谐共生型的社会秩序。紧接着背景介绍，作者又提出问题：这种秩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动力源何在？其运行机制和特征又为何？循着这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采取点面结合、纵横对比的方法，深入考察当地人的互惠体制、宗教信仰和政治生态，以此揭示地方秩序的整合机制。全书集思想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展现了真实的地方政治面貌，为维持藏族聚居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整体而言，系列二追随系列一的主题唱和。这个主题就是揭示川、青、藏接合部和川、滇、藏接合部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它们一根红线贯穿两个系列，涉及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11个侧面，如生计模式、婚丧制度、社会组织、信仰表象、权力博弈等。如不长期深入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的山山水水，并且结合文献解读历史，是无法获得这些异文化的特点的。

《艸野东南的民族丛书》集思想性与学术性于一体，通过深描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接地区的民族文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屏障，为以区域为基础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指南；特别是丛书作者用实证的方法收集材料，用科学的

概念、范畴来分析材料的学科规范凸显了研究的意义，让更多人看到区域文化的价值所在，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民族志对于区域文化有什么重要的贡献，族群、区域与文化类型是如何表现的，应该如何发挥民族志的特长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套丛书确实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长期以来，“中心/边缘”成为探讨少数民族文化的框架。那么，在这个框架中，研究重心究竟在何处？对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近10年来，要求把着力点放在边陲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倾向代表了人们对民族地区与内地、沿海地区传统地位的反思，带有打破“中心论”紧箍咒的意味，正可借用来帮助厘清汉夷观念的形成及其关系，重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在国家加大力度推动民族文化的研究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少数民族区域文化研究与汉族区域文化研究的比例悬殊，边陲少数民族的实证研究仍然稀少；优秀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就前一种情形而论，可能是因为对田野工作的认识不到位；就后一种情形而论，不仅有田野工作不够充分完备的原因，还有理论建构匆忙甚至缺乏必要的分析综合就任意拔高的原因。

综上所述，继续发挥中国民族学的区域文化研究传统、端正研究风气、完善研究体制依然任重而道远。今天，经济快速发展，交通状况不断改善，一方面为边疆民族的调查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当地文化中某些因素的急速覆灭。在这种情形下，民族学工作者更要听从时代的召唤，苟怀四方志，偏向边地行，为深化少数民族区域文化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导 论/1

第一节	屡禁不止的“夹坝”	1
第二节	相关研究回顾	5
一、	人类学理论视野下的抢劫研究	5
二、	清末以来新龙藏族社会的研究	11
三、	对清末以来藏族聚居区“夹坝”的研究	13
第三节	田野工作点与档案资料	16
一、	田野工作点	16
二、	档案资料	18
第四节	相关概念与解读框架	19
一、	相关概念	19
二、	解读框架	23

第一章 “夹坝”的类型与实施/25

第一节	“夹坝”的分类	25
一、	依据抢劫的对象进行分类	25
二、	依据抢劫者进行分类	31
三、	依据抢劫的性质进行分类	34
第二节	“夹坝”的装备	36
一、	康区武器发展简史	37
二、	民国时期瞻化武器装备情况	39
三、	民国时期瞻化武器装备的获得	46
四、	藏族群众与枪	49
五、	藏刀	50
第三节	“夹坝”的组织	53
一、	获取情报	53
二、	谋划	55

三、埋伏	56
四、激战	56
五、撤退	58

第二章 “夹坝”的维持机制之一：自然、生计与民情/62

第一节 自然条件的牵引	62
一、地理条件	62
二、气候	66
三、自然灾害	68
第二节 传统生计的不足	71
一、多样的生计方式	71
二、生计与抢劫的关系	81
第三节 荣誉观与民族性格	88
一、荣誉观	89
二、性格	94

第三章 “夹坝”的维持机制之二：习惯法及其运作/98

第一节 习惯法的主要类别	98
第二节 习惯法举要：报复性抢劫与血亲复仇	109
一、报复性抢劫	109
二、血亲复仇	115
第三节 习惯法举要：调解与赔命价	123
一、从互抢和血亲复仇到说官司	123
二、说官司	125

第四章 “夹坝”的维持机制之三：区域政治及其作用/142

第一节 党派卷入地方之争	142
一、汉藏之争	142
二、国共之争	148
三、中外之争	152
第二节 割据与角力	154
一、民国以来的地方政权建设	155

二、县与地方土酋之间的关系·····	160
三、土酋之争·····	167
第三节 “夹坝”主体的角色分析·····	171
一、地方的军事制度·····	171
二、亦军亦民·····	176

第五章 “夹坝”维持机制的打破/181

第一节 清政府的治理·····	181
一、“夹坝”之袭·····	181
二、鞭长莫及的法·····	182
三、土司“乏力”·····	185
四、军事镇压·····	187
五、藏管瞻对及清末改土归流·····	190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治理·····	195
一、依法而治·····	195
二、打击盗匪·····	202
第三节 人民政府的治理·····	204
一、县人民政府之政权建设·····	204
二、民主改革·····	209
三、国家法治建设·····	215
四、经济生活的转变·····	219

结 语/223

一、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暴力民风·····	223
二、具体文化机制下的暴力民风·····	225
三、从显到隐：风俗的流变·····	227

参考文献/230

后 记/246

附图表目录

图 1 沙堆乡村落分布	17
图 2-1 新龙藏族群众的骑马姿势	77
图 2-2 新龙藏族群众的盛装	90
表 1-1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瞻化县武器数量	39
表 1-2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瞻化县乡镇保甲户口统计	40
表 1-3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瞻化县民众自卫武器统计	41
表 1-4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瞻化县自卫组织调查情况	45
表 2-1 当时 1—10 月的气温记录	67
表 4-1 1949 年瞻化县千户（百户）情况	164

导 论

第一节 屡禁不止的“夹坝”

谈及抢劫，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此并不陌生；更甚者，有些人曾是抢劫的受害者。抛开当下生活现实，中外各类文献中关于抢劫的记载比比皆是。我们所熟知的《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就是典型的抢劫行为。人类学众多民族志中也记录了许多其他人群的抢劫行为。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 Pritchard）笔下的努尔人、珍妮·理查森·汉克斯（Jane Richardson Hanks）笔下的凯欧瓦印第安人、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笔下的斯瓦特巴坦人以及著名的游牧群体贝多因人、普什图人等，他们或者抢劫周边群体，或者互劫，从而引发报复性抢劫、血亲复仇等。倭马亚王朝早期诗人顾托密就曾如此形容贝多因人及其劫掠：“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①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有夸张的成分，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生活。与现实生活中零星的抢劫个例相比，民族志中某一历史时段内区域性、群体性、高频度与极具破坏性的抢劫显得格外“吸睛”。这些群体的生存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模式、习惯法等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同样，“夹坝”，一个屡屡出现在清代以来历史文献中的藏语词格外引人注目。在不同的文献中，该词虽有不同的释义，或指“劫盗”，或为“强盗”，或表“土匪”，或直指“抢劫”，但均含抢劫者暴力抢劫他者之意。从分布区域来看，抢劫事件遍布藏族分布的卫藏、安多、

^① 转引自〔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6页。

康区三大区域。例如，在藏北牧区，抢劫者既有以行劫为生的强人，也有临时抢劫的牧民。^①安多藏族聚居区也属抢劫高发区。如道光二年（1822年）的谕令中提到：“据西藏年班堪布贡噶堪木扎巴等稟报：喇嘛等进贡，自藏起程，于上年九月二十六日行至西宁当噶尔地方，将自备牛只、骡马赶赴草厂牧放，至当噶尔城外二十余里，被番贼二百余人抢去牛只、骡马、帐房等物，当经报明西宁办事大臣、陕甘总督、各衙门在案。”^②民国时期，俞湘文曾深入西北游牧藏族聚居区进行调查，记录了游牧藏族聚居区的抢劫现象。^③康区的抢劫更是屡禁不止。军队、政府官员及公职人员、商旅、寺庙等均是抢劫者的目标。20世纪上半叶，有人对西康榆科地区牧民有以下记载：“西康关外民众，多半是以抢劫为最光荣的英雄事业，不抢劫或怕抢劫的，他们认为是没有本领的弱者。”^④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在康区调查期间担心被抢劫，一方面请求“土匪”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寻求木里王的帮助。后有美国人类学家根据其经历出版了《喇嘛、土司和土匪：约瑟夫·洛克在中国藏区边地摄影集》^⑤一书。更有统计表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康区发生邮差被抢劫21人次。^⑥民国时期《康藏前锋》《康导月刊》《边政》《戍声周报》《华西边疆学会研究杂志》《新亚细亚》《边事研究》《边疆通讯》《边政公论》等报刊均对此种暴力行为屡有记载。

在康属众多区域中，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⑦藏族群众抢劫尤为频繁。文献中屡有关于该地抢劫的记载。早在清代，该地藏族群众的

① 参见格勒、刘一民、张建世、安才旦《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② 参见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1981年编印，第1538页。

③ 参见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7页。

④ 赵心愚、秦和平：《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⑤ Michael Aris, Patrick R. Booz.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R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New York: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2.

⑥ 参见甘孜州志编纂委员会《甘孜州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⑦ 今新龙县在清朝、民国等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后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叙述。

持续抢劫阻断官道商路，危及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引发了著名的“瞻对^①之战”。^② 清政府7次用兵瞻对，力图解决当地的“夹坝”问题。然而，直至清政府灭亡，该地藏族群众的抢劫仍未停止。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国家对以康区为代表的边疆地区的重视，不少学者深入康地，了解地方社会生产、生活状况，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任先生如此形容瞻化及瞻化藏族群众：“瞻化地薄，生业凋敝，其人多为盗劫，北道各险隘皆劫场也。”^③ 不仅如此，任先生笔下的瞻化藏族群众以抢劫为荣，以至于他在瞻化调查期间，西康省政府派军队对其进行保护。地方政府虽然极度憎恨“夹坝”，也力图将“夹坝”“法办”，但未能将“夹坝”之势禁止。即便在解放^④后一段时间内，该地境内的抢劫事件仍时有发生。调解抢劫案件，防止血亲复仇，维护社会稳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回顾该区历史，不难发现，抢劫事件在清以来尤其是清末以来的历史时段内一直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可以说，新龙藏族群众抢劫并不是个体的蓄意或突发行为，而是一种存在于一个具体时间段内的暴力民风。在暴力民风的环境下，抢劫事件一幕一幕地上演。清人张继就曾言瞻对“其俗尚武，其人好斗”^⑤，这描述如此看来也就十分贴切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抢劫是某些游牧群体历史上甚为普遍的一种行为，也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新龙藏族群众的一种暴力民风，更是政府治理边疆的“顽疾”。然而，时光荏苒，历史上那些曾以抢劫著称的民族群体及其社会也发生了激烈的变迁。例如，苏丹内战给努尔人及邻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数百万人丧生于战争的炮火中，大规模的人群迁居，其中许多人成为难民，普里查德笔下的努尔人以游牧为主的生计方式也难以继。对于新龙藏族群众而言，持续抢劫、报复性抢劫、血亲复仇的社会

① 瞻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旧称，原名呷绒（藏语“鱼之河谷”之意），为元时该地第一代土司领地之称，历属土司统治。清末，赵尔丰川边藏族聚居区改土归流时于宣统三年（1911年）置瞻对设治委员，为怀柔县。民国元年（1912年），改怀柔县为瞻化县。1951年，改瞻化县为新龙县。

② 参见陈一石《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一），载《西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③ 任乃强：《西康札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为1949年10月1日，瞻化县（今新龙县）和平解放时间为1950年7月20日。本书中的“解放”时间是指当地和平解放时间，而非指新中国成立时间。

⑤ 张继：《定瞻厅志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油印本。

环境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自康区民主改革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以新龙为代表的康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安定，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与内地经济社会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群体性的、高频度的、极具破坏性的暴力抢劫历史已一去不复返。可以说，新龙藏族群众的抢劫民风从“显性”过渡到“隐性”，新龙社会从“乱”过渡到“治”，阿来笔下的“铁疙瘩”^①终于融化。

至此，难免让人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新龙藏族聚居区的暴力风俗发生了转变？对于暴力风俗本身而言，此种群体性的、高频度的、极具破坏性的暴力抢劫风俗的具体维系机制是什么？或者说抢劫民风存在的具体历史社会环境是什么？

从人类学对文化探讨的角度而言，应对这种暴力风俗进行怎样的理解呢？暴力风俗作为整个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从对国家的社会治理及社会稳定而言，对此种暴力风俗的探讨对当今藏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以及社会治理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相关问题还有许多，而这些问题的回答就需要以清末至民国这一历史时间段新龙藏族群众的抢劫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去分析该区域的具体历史社会环境与文化。然而，本研究并不追求对新龙藏族群众抢劫风俗进行全面透析，而是秉承人类学理解“他者”的学科传统，试图达成对藏族群众抢劫古风的一种历史与文化的理解。探究该地区藏族群众抢劫的具体维持机制以及具体维持机制的打破过程与方式，达到对此暴力民风进行深层次历史与文化的解读目的。依据此种民风研究思路，本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两个问题。

第一，清末至民国这一历史时段中，新龙藏族群众抢劫风俗的具体维持机制是什么？无疑，如果把抢劫看成一种“果”，那么必有致使抢劫发生的“因”。具体而言，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一是自然、生计与民情方面，频繁的抢劫与当地传统的生计方式特别是游牧的生计方式有什么关系？是应对资源不足及贫困生活的一种补充手段吗？与当地社会自然环境又有怎样的关联呢？与新龙藏族群众的性格与荣誉观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其二是习惯法方面，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尤其是习惯法是怎样运作的？与地方抢劫又有怎样的联系呢？其三是区域政治关系

^① 参见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